

语言与文化差异性的方法论

——再探周清海教育哲学思想

董伟武 陈志锐

摘要

多元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性客观存在，由此而生的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为了解决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均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多元纷呈的方法论景观。其中，周清海先生所创制的融濡论在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领域代表着当代的“新加坡经验”，也代表着语言与文化差异性方法论的当代国际水平。融濡论建立在进步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包括融论、濡论和差异性和谐等基本内容，具有鲜明的以渐进与和谐为特色的理论个性，彰显出先进性、稳妥性和务实性等三大理论优势，是拥有巨大实践潜力和广阔社会发展空间的方法论，必将为人类减少来自语言与文化方面的冲突甚至战争提供可行的治理方案，并因此具有超历史性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语言与文化 差异性 方法论 融濡论 差异性和谐

董伟武，广西大学，联络电邮：dww2005@126.com。

陈志锐，南洋理工大学亚洲语言文化学部，联络电邮：cheelay.tan@nie.edu.sg。

一、研究背景

中国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尽管“新加坡只是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小红点”（吴俊刚，2017），但她却以“刚强勇猛，自强不息”（吴俊刚，2017）的建国精神打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其中，多元和谐的语言与文化形成了人类史上奇特的人文景观。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语言与文化被新加坡政府从市井交际手段上升到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来加以严肃对待，视“语文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李光耀，2011，页47）“以英文为谋生手段”（李光耀，2011，页46）和“通过母语以保留传统文化价值观”（李光耀，2011，页46）的双语政策从制度上构建了新加坡语言与文化现代化的内在结构，并通过双语教育重构了新加坡的多元语言与文化环境，也从实践上印证了“抵抗语言丧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Schwartz，2018，p.344）的论点。

在这样的双语政策环境下，新加坡华文学界不断探索华文国际化和华文代际传递问题，并涌现出一批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周清海先生是其中最著名的杰出代表。作为新加坡“华语文教学的前驱”（周清海，2018a），周先生从研从教四十余载，思想深邃，著述丰硕，蜚声国际。在全球化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复杂交织的大背景下，我们从周清海先生的教育哲学思想入手，深入挖掘新加坡学界对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理论建树，归纳总结新加坡在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形成的“新加坡经验”，将有助于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提供新的方法与路径，也将有助于奠定新加坡在当代语言与文化研究与教学领域里的世界领先地位。

二、研究目的

周清海先生的教育哲学思想，是贯穿于他的一切华文研究和教学工作及其成果的灵魂，同时也集中反映了新加坡华文学界的当代智慧。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周先生在处理语言

与文化差异性问题时所形成的教育哲学思想。通过研究，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1. 周清海先生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是什么？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2. 周清海先生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的内在结构是什么？
3. 周清海先生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的理论个性是什么？具有哪些理论优势？

三、方法论综述

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是指在一种语言与文化内部的不同变体之间或几种语言与文化之间因其各自的差异性而产生的交流障碍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次生问题¹。众所周知，人类语言与文化种类繁多，起源各异，流布四方，变体丛生。语言与文化差异性与生俱来，与时俱进。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中将人类文明划分为七个时期，并指出“音节分明的语言”（摩尔根，2005，页8）开始于第一个时期——低级蒙昧社会时期。因此，可以说，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是几乎贯穿人类史始终的基本问题。同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一直在探索前行，尝试着不同的方案，并先后形成了具有不同理论品质的多元方法论。对此，我们在审慎考察人类语言与文化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并尝试性地归纳出11种主要的方法论（见下表），其目的是为后续的研究建立一个理论“靶子”和“参照物”，便于展开比较与讨论。

1 本文的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特指华语与华文内部的不同变体之间的差异性问题的。

项目种类	代表人物	哲学基础	理论个性	理论优势	理论局限
中庸论	孔丘 (Kong Qiu)	调和主义思想	妥协、容纳	温和、理性	暂时性 (内)
普遍论	亚历山大 (Alexander)	殖民主义思想	宽容、控制	替代、转移	虚假性 (间)
归一论	李斯 (Li Si)	专制主义思想	独断、强制	法定、速效	双层化 (内)
体用论	张之洞 (Zhang Zhi Dong)	民族主义思想	优先、吸纳	巩固、改良	凝固化 (间)
实验论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实用主义思想	实验、功用	直观、易信	经验性 (内)(间)
重建论	陈独秀 (Chen Du Xiu)	革命主义思想	革新、重建	减负、彻底	理想化 (内)
自觉论	费孝通 (Fei Xiao Tong)	结构主义思想	主导、一体	融合、消除	依赖性 (内)(间)
共存论	李光耀 (Lee Kuan Yew)	多元主义思想	平等、务实	保存、合济	分立性 (内)(间)
延异论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解构主义思想	碎片化、消解	民主、再生	分散性 (间)
话语论	爱德华·W·萨义德 (Edward·W·Said)	后殖民主义思想	创制、置换	型塑、深层	长期性 (间)
稀释论	约翰·汤林森 (John Tomlinson)	文化帝国主义思想	挤占、重构	跨界、渗透	弱控性 (间)

注：“(内)”代表“一种语言与文化的内部”；“(间)”代表“几种语言与文化之间”。

1. 中庸论。以孔丘为肇始创制的儒家学说本是主要用来处理社会伦理关系的价值工具，但在他身后这个学说在应用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也是这种拓展的一个方面。儒家学说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的方法论主要是中庸论。中庸论强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1992，页22）即遵循事物的运动规律，修正过与不及的差异现象，就是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正确方法。如果能像舜那样，“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

端，用其中于民”（《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1992，页26），则能够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1992，页68）的理想效果。

2. 普遍论。尽管亚历山大（Alexander）大帝常常被人们以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贴上标签，但不能因此遮蔽了他在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的杰出智慧与成功经验。我们把这种实践理性归纳为普遍论²。众所周知，亚历山大通过征战缔造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在这个帝国内存在着种类众多的语言与文化及其带来的巨大差异性，同时，由此而生的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也非常复杂，并直接危及着帝国的统一。亚历山大利用以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为核心的普遍论理念对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进行了弥合，有效地推动了多元语言与文化的共存共融。以“收集全世界的书”，实现“世界知识总汇”为建馆初衷而闻名后世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这种普遍论理念成功实践的最好的历史注脚。

3. 归一论。秦丞相李斯从一开始就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视作攸关秦帝国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问题来处理。吴大伟在其《〈说文解字〉学说、字源、文化》中叙述了秦统一时全国各地存在着的复杂语情和文情：“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吴大伟，2012，页42-43）李斯以归一论应对，建议并推行统一文字，撰写《仓颉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吴大伟，2012，页43），又“以趣约易”（吴大伟，2012，页43），创制了小篆和隶书，统一了度量衡，有力地推动了秦帝国的快速融合与统一。尽管李斯利用国家暴力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留下了“焚书坑儒”的千古骂名，但是从历史的长期效应上看却不失为一种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速效方法论。

4. 体用论。面对西学的强势冲击，十九世纪中国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体用论，试图化解西学与中学紧张关系背景下的语言

² 普遍论，即以普遍主义替代特殊主义，强调主导的语言与文化，弱化语言与文化的特殊个体的哲学方法观。

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他首先承认和接纳西学的现实存在，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张之洞，1898，页25）。其次，他强调中学是中华语言与文化的本体，是根本，认为倘若“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张之洞，1898，页25）“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张之洞，1898，页26）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体用论主张：“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张之洞，1898，页26）

5. 实验论。受培根哲学的影响，杜威（Dewey）立足实用主义哲学立场，推崇实验主义方法，并形成了解决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实验论。他的嫡传弟子胡适曾生动地举例阐释过实验论方法论：“譬如科学家先有了两种液体，一是红的，一是绿的，他定了一个假设，说这两种液体拼合起来是要变黄色的。然而这句话不是一定可靠，必须把他试验出来，看看拼合的结果是否黄色，再来判定那假设的对不对。实验主义所当取的态度，也就和科学家试验的态度一样。”（姜义华，2001）在针对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杜威主张把生活当作实验室，把问题放进生活中去发现，去分析，去解决。

6. 重建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继“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这次运动的主将之一，身处多元语言与文化交锋漩涡中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文学革命论，主张重建中华文明。他认为革新政治必先革新文化，并誓言：“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

独秀，1917) 誓言中的“三个推倒”和“三个建设”充分揭示了他的语言与文化差异性的重建论方法论意蕴。

7. 自觉论。面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著名文化学者费孝通从结构主义出发，提出以“和”为核心的多元语言与文化的自觉论方法论。自觉论旨在通过主体的“文化自觉”³达成多元语言与文化的和谐共生关系。该方法论将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类型。对于国内的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费先生主张各语言与文化关系主体需要尊重“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2000，页13)；对于国外的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费先生则强调各语言与文化关系主体需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2000，页13)和“和而不同”，并通过“跨文化交流”模式实现语言与文化间的有效沟通。

8. 共存论。作为一个“要把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团结成一个国家”(李光耀，2013，页14)的新兴国家的领导者，李光耀先生带领自己的治国团队创造了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新加坡奇迹”，并以个人的求学经历与治国经验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思想与方法，我们将之概括为“共存论”。共存论奉行多元主义理念，讲究“各民族的教育与语言平等”(李光耀，2013，页25)，并体现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政策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倡导和“推广双语教育”(李光耀，2013，页21)，“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源流”(李光耀，2013，页21)，并“以英语作为主导的共通语”(李光耀，2013，页21)，实现多元语言与文化的长期共存。同时，大力兴办“混合制学校”(李光耀，2013，页28)和统一“课本与课程内容”(李光耀，2013，页27)，力图通过“异中求同”(李光耀，2013，页27)将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真正“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 and 共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李光耀，2013，页20)的国家。

3 据费孝通先生解释：“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又是指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费孝通，2000)

9. 延异论。从表面上看，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在《论文字学》中只是从语言与文字、说与写的关系角度批评“卢梭和莱维-斯特劳斯都蔑视文字，而对言语的作用大加赞扬”（德里达，1999年，页203）的立场，其本质上折射出他更深层次地反对传统与秩序，反对言语中心主义，强调多元化的差异，张扬解构与开放的延异（Différance）论方法论。在此，延异由“延缓”（deferment）与“差异”（difference）两个词合成，表示最终意义不断被延缓的状态。延异论的运动图式是通过将文本的意义平面化与碎片化，继而无限开放文本的意义，“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外面的东西不断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替补”（德里达，1999年，页4），从而组合成新的无数的“意指链”。从这个意义上看，延异论在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尤其是某一语言与文化变体间的差异性问题上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方案。

10. 话语论。在处理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后殖民主义学者萨义德（Said）在其《东方学》中给我们提供了话语论方法论。他发现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the Occident）在不断拓殖中逐渐形成“被‘东方化’（Orientalized）”（萨义德，1999，页8）了的东方（the Orient）形象，并将作为一种话语方式的东方学不仅用以确证与他者（the Other）之间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身份符号，而且将之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萨义德，1999，页4）该方法论的核心在于，西方采用形塑东方的语言与文化形象，创建东方学的话语形式，重构双方的语言与文化关系序列等手段力图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并利用其在双方的语言与文化关系序列中的“位置的优越（positional superiority）”（萨义德，1999，页10），“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萨义德，1999，页10）

11. 稀释论。与萨义德的话语论从东西方的文化权力关系角度关注话语不同，汤林森（Tomlinson）则从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途径角度关注话语。他受福柯文本稀释理论的启发，认为帝国主义主要从“媒体帝国主义”（汤林森，1999，页41）话语、“民族国家”（汤林森，1999，页46）话语、“全球资本主义”（汤林森，1999，页50）批判话

语和“现代性的批判”（汤林森，1999，页54）话语等四个途径通过稀释话语符号意义的方式来削弱、置换乃至同质化他者的语言与文化的新殖民行径。我们将这种处理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称作稀释论。稀释论的理论思路是文化帝国主义者依托市场的全球化和强大的文化产业对他者的语言与文化进行长期稀释，不断扩大自身的语言与文化市场份额，建立不平等的语言与文化双边关系，谋求对他者的语言与文化话语霸权，进而在话语霸权的基础上以“混合置换”的方式和平消解双方语言与文化之间原有的差异性。

四、研究对象与方法

周清海先生包括方法论在内的教育哲学思想，广泛散布于他的大量论著和讲稿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将周先生的论著和讲稿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发掘周先生用以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

为实现所设定的上述目的，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举例论证法、对照比较法和系统构建法来展开具体研究。首先，文献研究法。我们将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提炼出11种用以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概括出它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理论个性、理论优势以及理论局限，并为下一步展开同周清海先生的方法论比较提供靶子。其次，文本分析法。我们将针对周先生的论著和讲稿进行分析，从中概括出周清海先生用以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融濡论。再次，举例论证法。我们将充分依据周清海先生的论著和讲稿中的事例论证周清海先生融濡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又次，对照比较法。我们将把提炼出的11种用以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作为对照物，分别与周清海先生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并由此凸显周清海先生的方法论——融濡论在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的显著优势。最后，系统构建法。我们将借助系统构建法把周清海先生的融濡论从核心概念、内部结构到整个系统逐次勾画出来。

五、融濡论

“融濡”一词，在本文中意指主体间通过打破壁垒、加强交流、相互润泽、彼此包容来实现更大范围的语言与文化的一体化融合。我们把它提炼并概括为融濡论。融濡论包括融论、濡论和差异性和谐等三个组成部分，是周清海先生用以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

1. 融濡论中的“融”论

“融”论，主要指周先生针对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差异性在华文教育中倡导的开放、交流、接纳和包容的教育主张，在周先生的教育哲学的方法论思想中具有“战略性”的地位。对此，周先生有过比较多的论述，体现出一位著名国际语言与文化战略学家的高屋建瓴与深谋远虑。

(1) “融”论的趋势论

在语言与文化发展趋势的问题上，周先生是自然趋异和被动趋同的统一论者。他首先肯定在不同的华语区中语言与文化发展是一个趋异的差异性形成的自然过程。他认为：“无论是不自觉的还是自觉的，各地华语的趋异都难以避免。”（周清海，2007，页92）同时，他又根据国际形势的最新变化作出一个基本判断：“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汉语大融合的时代。”（周清海，2017a，页61）这个基本判断的依据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迎来了汉语走向世界的新局面。这个时候，也正是现代汉语和各地华语相互融合的时期。”（周清海，2014b，页1）“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扩展，普通话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各地华语的相互靠拢，使华语原来具有的共同核心更加坚实。”（周清海，2007，页93-94）他最后强调这种相互融合导致的华语区间的语言与文化的趋同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周清海，2007，页93-94），而世界性的华语文发展将由自然趋异和被动趋同这两股力量的现实矛盾运动来决定。

(2) “融”论的方略论

在语言与文化发展方略的问题上，周先生首先强调的是建立华语区内广泛的共识。他认为，由于华语区间的语言与文化的趋同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如果要这种趋同更显著，则华语区必须有更大的共识”。（周清海，2007，页 93-94）为了促成这个共识，周先生先后倡导了两个概念——“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和“大华语”。2007年周先生在谈到华语的规范问题时曾说过：“规范，既要注意交流的需要，也要尊重各个区域相对的自主性，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倡导‘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这个理念。‘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是一套简单而且稳定的共同核心语言要素，它本身不是任何一种具体自然语言，而是一组语言特征，它存在于大同小异的各汉语变体之中，所有的汉语共同语区域变体一起组成一个没有家长的语言大家庭：北京汉语、广州汉语、上海汉语、新加坡华语、台湾华语、纽约唐人街华语。既要维持大同，又要尊重小异，应该给予汉语共同语的各地特色以充分的地位和完整的尊严。要摆脱‘中心’‘一统’等过时观念的束缚（徐杰，2006）。”（周清海，2007，页 95）2017年他在《“大华语”与语言研究》一文中坚定支持李宇明先生提出的“大华语”概念及其定义（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周清海，2017a，页 62）其次，周先生非常注重华语区之间的语言与文化交流。他认为：“中国现代汉语和各地‘华语’、‘华文’，差距相当明显，口语的差距更大。所以，华语区之间，语言的和谐与沟通，就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尽管现代汉语的输入局面逐渐转为向华语输出，但促进语言和谐与沟通仍旧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周清海，2018a）“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和华语区的交往，在语言方面，需要更多的协调与融合。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的交流，让华语在交流中融合。”（周清海，2017a，页 62）再次，周先生积极倡导各华语区华文研究与教学机构之间开展务实合作。他认为：“我们也应该思考和各华语区华文研究与教学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特别是在中国‘一带一路’的策略下，我们更应当加强和东南亚华语人才的交流与引进，探讨为华语区华文教学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和专业认证的可行

能性。这是未来的大趋势。”（周清海，2018a）最后，周先生特别强调了各华语区语言与文化发展上的几点注意事项。其一，华语必须保留共同的语言与文化核心。他认为：“从交流的需要说，华语必须保留共同的核心。各华语区如何在交流和自主之间保持平衡，需要慎重考虑。尽管华语的地区性变异不少，但只有维持华语的共同核心，向共同的核心靠拢，才有利于华语区之间的交际，也才有利于华语走向世界。”（周清海，2007，页92）“华语区的华人，除了新移民之外，老华人的第二、三代，乡情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他们大部分都没有‘乡愁’。但高度一致的书面语教育给华语区留下共同的文化与习俗。在华文教材的内容方面，华语区之间传统地维持了最大的共同点，维持了共同的文化核心。这个传统，应该继续保持下去，因为只有在文化和语言方面有共同的核心，才有利于华语区之间的交际，也才有利于华语走向世界。”（周清海，2017a，页62）其二，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他认为：“语文教育跟语言、文化、历史甚至跟我们学生的生活，都有有机的联系。看语文的问题，不能只强调语言能力，也不能只强调文化，只强调一方面都是极端的、偏颇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把这两条线交织起来。”（周清海，2014a，页49）其三，祛除“中国中心论”。他认为：“中国强调的汉语传播，一向都是以中国为中心。他们编写的汉语课本，无论课文的内容，词语的用法，都是以‘认识中国’，‘说好中国故事’为核心。这从华文教学发展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全面的。”（周清海，2018a）“我们认为，从华语走向世界这个新的视角观察，华语的应用与规范问题，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只从中国国内的需要或角度考虑。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的交流，让华语在交流中融合。”（周清海，2016a，页16）“当现代汉语只限于中国大陆时，以推广普通话为目的去考虑语言规范，当然可以不必顾及其他华语区。但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华语的规范，考虑的范围就广了。这要求我们有国际视野，既要注意交流的需要，也要顾及各个区域相对的自主性。”（周清海，2007，页91）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各地区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自主性、自己的语言特色，不只妨

碍国际间的交流，也让自己陷于孤立。”（周清海，2007，页92）

（3）“融”论的结果论

在语言与文化发展结果的问题上，周先生首先强调结果产生的“自然性”。他认为：“国际化之后，出现具有共同核心的华语是必然的趋势。华语区之间频繁的交流使语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和以前相互隔离的局面，大不相同。普通话对各地华语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是交流中难以避免的。其实，普通话的扩大影响，对各地华语的相互靠拢，出现具有共同核心的华语，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这个影响是在交流中逐渐发生的，是在沟通交流中自然取舍的结果，而不是强行统一的。”（周清海，2007，页95）其次，周先生指出发展结果会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性”。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因为交流的需要，和外面华语世界的语言接触频繁，普通话和其他地区的华语差距正在逐渐拉近。各华语区的新词新语大量涌入普通话，新的表达方式逐渐出现在大陆的书面语中，这也使普通话出现新的面貌。频繁的交流使语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这和以前的相互隔离的局面大不相同。普通话对各地华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是交流中难以避免的。语言交流的结果，就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周清海，2007，页93-94）再次，周先生强调在华语文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元素的“关键性”。他以新加坡的华语文发展为例指出：“华语文在新加坡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华语文商业语言价值的提高，以及新加坡华语文教育和中国教育体系联系的可能性，使新加坡华语文教学更具有发展的潜能。……中国的发展为华文程度高而英文程度低的人提供了许多发展的空间，也为新加坡出现真正精通双语的人才提供了条件。”（周清海，1996，页128）最后，周先生指出了语言与文化发展结果的“必然性”。他认为：“随着世界各地华人交往频繁起来，华语文无疑地也将成为华人之间认同的语言。”（周清海，1996，页128）

2. 融濡论中的“濡”论

“濡”论，主要指周先生针对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差异性在华文教育中倡导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和平缓进的教育主张，在周先生的教育哲学的方法论思想中具有“战术性”的地位。关于这方面，周先生讲得并不多，但比较精辟。他结合自己的语言学习经历，曾经这样讲道：

“语言的掌握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内化的过程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我拿自己做例子，我小时候的朋友有华人，更多的是马来人。我小时候打架的对象是马来的小孩子。你可以想象到，在这中间，用马来语跟他们吵架或打架，我的马来语就学上来了。我对马来语的理解，远远超过许多学马来语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进步，我们所谓的语言习得。语言习得是我们学语言最好的办法。沉浸式汉语教学不是外来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发现。从大体的来看，我们今天在语言教学法这个部分受西方的影响非常大。我担心的是把西方当成一切，所以我特别提出来接受他们的经验没问题，可是要怎样把他们的经验本土化？这个本土化，中国的典籍中有太多的东西。”（周清海，2016b，页 5-6）这里提到的“内化”、“习得”和“沉浸”都是周先生“濡”论的生动描述。“内化”反映“濡”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习得”反映“濡”论的生活性与现实性；“沉浸”反映“濡”论的自然性与渐进性。同时，他强调必须将潜移默化（“濡”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现代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他认为：

“语言教学里谈文化的问题，我常常提潜移默化，让他不知不觉地接受这个。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把我们的文化跟现代中国结合起来。有两个值得思考的，第一个是要他潜移默化，第二个是要跟现代生活联系起来。”（周清海，2016b，页 6）为了在华文教育中落实“濡”论，周先生提出了六条纲领性的指导意见：

“第一，我们要注重调动和整合华语区的语言资源，让有条件的华语区参与华语文研究与推广的工作。

第二，注意华语文的口语化、大众化，而不是文言化。

第三，让语言文化的学习在地化（本地化），让教学人员在地化，让语言企业在地化。

第四，注意多地合作，优势互补，培养有国际观且了解华语区的语文和语文教育的人才，为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奠下人脉基础。

第五，思考华语区第二语言水准的华语文与第一语言水准相衔接、第二语言水准的华文和专业华文相衔接的问题。

第六，区域语文、专业华语和语文教材，在选材与教学中要向共同核心倾斜。”（周清海，2018b）

3. 融濡论承载着差异性和谐

在融濡论中，无论是“融”论，还是“濡”论，都承载着周先生厚重的和谐理念。这种和谐理念体现在周先生的教育哲学思想的目的论、工具论和结果论之中。

周先生长期处在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种族的现实环境之中，寻求差异性和谐是安身立命的需要。因此，在他的教育哲学的方法论中，“融濡”观念是顺应生存需要自然而降生的。可以说，差异性和谐是内容，“融濡”观念是形式，“融濡”观念是服务于差异性和谐的，是承载差异性和谐的。对此，周先生有过这样的表述：

“语言，对个人、对国家，都是一种资源。在全球化的时代，掌握多种语言资源，是个人或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处理语言问题、处理语言教育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这关涉民族和谐、民族认同、国家战略等更高层面的问题。”（周清海，2017b，页1）

“改革开放之后，汉语进入了大融合的时期。和谐融合关系到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周清海，2017b，页1）

同时，周先生指出了母语和母语教育问题对于树立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感以及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他认为：

“母语和母语教育问题，和国家民族的认同密切相关。现代汉语是国家认同的语言，是每个中国公民一定要掌握的语言，也是汉民族认同的语言。”（周清海，2017b，页1）

“大都会里的语文教学所面对的是国际化、现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问题。在教学内容方面，将更突出国际化与现代化的重点。……但是，国际化和现代化必须以本土化为基础，因此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将更受重视，借以树立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感。”（周清海，2014a，页49）

可见，周先生非常珍视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性和谐，将语言问题与语言教育问题提高到民族和谐、民族认同以及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与对待，并将之凝结于“融濡”观念之中。

综上所述，在周清海先生的融濡论方法论中，融论代表着战略性维度，濡论代表着战术性维度，差异性和谐则代表着方向性维度，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并共同推动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主体通过融濡来弥合差异性本体间的现实鸿沟，进而寻找到实现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和谐的理想进路。

六、讨论

讨论I 融濡论的哲学基础

众所周知，在哲学上，任何一种方法论必定拥有与之相适应的哲学作为基础，没有哲学基础的方法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正如上表所示，我们归纳出的11种方法论都有各自的哲学基础⁴。因此，“周清海先生的融濡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是我们必须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周先生的融濡论方法论中蕴藏着自然主义、国家主义、实用主义、多元主义和进步主义等多种哲学思想。哪一种哲学思想能够担当“基础”角色需要我们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和判断：

4 哲学基础是在该方法论中占主导地位并起着决定性意义的哲学思想而确定的。

1. 判据之一：占据主导地位。在众多文本中，我们发现周先生反复强调这些理念：反对语言与文化对立，主张实现多元语言与文化平等基础上的“种族的和谐、语言的和谐、宗教的和谐”（周清海，2018b）；反对“创造自己特点的华语”（周清海，2016a，页15），主张建设“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周清海，2016a，页13）；反对语言与文化话语霸权，“我们说的华语是大华语的新马版，你们（指中国大陆的朋友）说的普通话是大华语的大陆版。这些都是大华语。不要认为人家的不标准就不是现代汉语，不要抱这样的观念”（周清海，2018b），主张世界各华语区的语言与文化变体同属于大华语的组成部分；反对脱离具体的语情与文情实际处理华语文教学问题，主张“让语言文化的学习在地化（本地化），让教学人员在地化，让语言企业在地化。”（周清海，2018b）因此，我们认为，平等、民主、多元和实用等理念主导着周先生的融濡论的哲学思想。

2. 判据之二：体现主体特色。周先生的融濡论方法论最大的特色实质上就体现在“融”和“濡”两个字上。“融”蕴含着打破阻隔、沟通交流、积极进取的精神内核，能够很好地刻画出该方法论反保守主义的哲学倾向。周先生勇于放弃创造新加坡人自己的语言的思想，赞同“大华语”概念，提倡建立全球华语的“共同核心”，积极推动“解决全球华语沟通中出现的问题”（周清海，2018b）等都印证了这个“融”字所包含的上述精神特质。“濡”则体现出尊重实际、渐进渗透、注重实效的价值追求，能够投射出该方法论反激进主义的哲学映像。周先生在华文教育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为：“现在提出的‘保底不封顶’是一个政策上的决定，但专业上应该如何加以落实，仍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对‘底’和‘顶’都应该有清晰的概念，才不至于让‘保底不封顶’沦为动听的口号。”（周清海，2018a）同时，他坚持以“生活习得”为核心理念长期推动华文教育研究与教学。这些都和“濡”字所包含的上述精神品质相契合。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进取、务实和渐进等理念能够体现该方法论的主体特色。

综上所述，周先生的融濡论兼有以平等、民主、多元和实用为内

容的主导理念和以进取、务实和渐进为要素的特色理念，可谓拥有非常厚重的哲学基础。按照上表中使用的标准，我们结合哲学史发现，与上述 11 种方法论所拥有的哲学基础不同，融濡论的哲学基础与具有平等、民主、多元和实用等特性的进步主义思想的匹配度最高。因此，我们只能暂且把周先生的融濡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定位于进步主义思想 (Progressivism)。但是，作为周先生的融濡论哲学基础的进步主义思想与 18~19 世纪美国盛行的进步主义社会哲学思想以及 20 世纪上半期盛行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哲学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个论题我们将会在今后的研究中作为专题探讨)

讨论 II 融濡论的理论个性

理论个性是反映一种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质的规定性的总和，也是我们深刻认识特定理论的本质属性的一扇窗口。因此，为了更进一步地准确把握周清海先生的融濡论方法论，将该方法论的理论个性问题纳入我们的讨论范围是十分必要的。

和上表中的 11 种方法论一样，周清海先生的融濡论方法论同样具有自己的理论个性。根据融濡论的精神本质，我们在反复筛选相关词语的基础上认为：“渐进”和“和谐”最能够概括与表证融濡论的理论个性。

1. “渐进”理念。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得知，首先，周先生的融濡论不同于专制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归一论，也不同于革命主义思想基础上的重建论，它们依靠专制王权或革命暴力所获得的在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的速效或彻底是周先生的融濡论所不取的，也是无法容纳的；其次，周先生的融濡论不同于殖民主义思想衍生的普遍论，也不同于脱胎于后殖民主义思想的话语论，更不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稀释论，它们依靠替代、置换或挤占所能达成的在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的控制、转移或重构也是周先生的融濡论所不取的，更是无法容纳的；再次，周先生的融濡论不同于民族主义思想规制下的体用论，也不同于解构主义思想体系下的延异论，

它们依靠改良或消解所实现的在解决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的主体固化或去主体化同样是周先生的融濡论所不取的和无法容纳的；最后，尽管中庸论、实验论、自觉论和共存论与周先生的融濡论也不尽相同，但是，中庸论的容纳理念、实验论的功用理念、自觉论的融合理念和共存论的平等理念均被融濡论所吸收，并在注入新鲜内容的基础上形成融濡论的“渐进”理念。“渐进”理念充分刻画出了周先生的融濡论所内蕴的尊重主体、接纳多元、积极融入、审慎推进、讲究实效和追求进步的精神本质。

2. “和谐”理念。如果说“渐进”理念反映的是周先生的融濡论的运行方式及其相关要素的话，那么，“和谐”理念则更深刻地彰显出该方法论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在上表的11种方法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和谐理念的印迹，最明显的是调和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中庸论和结构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自觉论。即使弥漫着帝国主义思想的普遍论、话语论和稀释论，也或多或少地以宽容、置换或渗透等方式投下一抹亲近和谐理念的光晕。但是，周先生的融濡论的和谐理念从本质上与上述所涉及的和谐理念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大和谐理念。融濡论的和谐理念是着眼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语言与文化的和谐，是上升到国际关系高度的人类文明的和谐，不是旧式的一家一族一国的和谐。其二，特定和谐理念。融濡论的和谐理念特指在处理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时追求的和谐，不试图指涉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三，动态和谐理念。融濡论的和谐理念不仅仅单纯作为名词来描写一种至善完美的静态平衡，更是作为动词在永恒发展与不断进步意义上用以指涉一种流动的动态平衡。这是上述蕴含和谐理念的方法论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正义层次。其四，现实和谐理念。融濡论的和谐理念不是陷入乌托邦式的妄想，而是基于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所带来的种种不和谐事实与问题的基础上而产生的理性观念。这与传统的唯心主义者所提倡的和谐理念迥然不同。

总之，“渐进”理念和“和谐”理念分别从运行方式和价值追求上深刻而形象地勾勒了。

周先生的融濡论的理论个性，并使该方法论鲜活的理论生命从晦暗的思想深处逐步走出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它、亲近它和运用它。

讨论III 融濡论的理论优势

一种理论在实践中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在于理论自身是否具有一定的内在优势。因此，考察一种理论的内在优势是我们对该理论在实践中生存与发展能力的预判与评估，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论题。

与上表中的 11 种方法论比较，周清海先生的融濡论拥有进步主义的哲学基础，张扬着以“渐进”与“和谐”为特色的理论个性，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优势。归纳起来，融濡论的理论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先进性。从目的上看，周先生的融濡论是通过对本国和全球华语区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有效干预来实现本国和全球华语区的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平等、民主与和谐，具有追求文明与进步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内容上看，融濡论首先继承了历史上传统方法论的积极成分。如上所述，中庸论、实验论、自觉论和共存论中的可取理念被融濡论所吸收。其次是融濡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建构。譬如，融濡论对传统的和谐理念的改造与重塑等。从功能上看，融濡论是用以解决当代本国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工具，也是用以解决当代全球华语区多元语言与文化变体之间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工具。因此，与上表中的 11 种方法论相比，先进性的理论优势在融濡论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2. 稳妥性。从理论态度上看，周先生的融濡论首先反对保守。体现之一是反对在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上坚持民粹主义。周先生反复强调“新加坡不创制自己的华语文”，“新加坡华语文的标准向普通话靠拢”等主张。体现之二是坚持“大华语”概念，积极推动全球华语文的国际大融合。体现之三是努力改造殖民时期残存的不平等不合理的语言与文化秩序。周先生非常赞同新加坡长期推行的双语政策，因为这项政策打破了殖民时期的语言与文化霸权，实现了新加坡

多元语言与文化的和谐共存以及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同时，融濡论又反激进。从融濡论的精神本质中可以看出，周先生既不赞同殖民主义的普遍论、专制主义的归一论和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论，也不赞同革命主义的重建论，而是比较欣赏多元主义的共存论、实用主义的实验论和调和主义的中庸论。因此，既反保守又反激进的融濡论便呈现出稳妥性的理论优势。

3. 务实性。从方案设计上看，周先生的融濡论既尊重现实又顺应趋势，体现出务实性的理论优势。首先，融濡论是立足现实、忠于现实的方法论。面对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周先生关注最多的是特定的国情语情文情及其动态变化。他认为：“我国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国际化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小国家。语言和种族问题，是我们应该小心处理的问题……随时都得注意调整。”（周清海，2018a）“要华文的程度能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一样，是不现实的。”（周清海，2018a）其次，融濡论又是顺应趋势、迎接潮流的方法论。随着“大华语”“逐渐融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清海，2016a，页16）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的出现，周先生和阿伊莎·萨迪卡（Ayesha Siddiqi）等人一样，对跨国文化交流“持开放和宽容”（2019，p.86），并及时提出了“建立一个具有开阔眼光的研究团队，扩大语言的研究范围”（周清海，2016a，页16）、“组织海外编写小组，为海外提供汉语教材、编写词典”（周清海，2016a，页16）和壮大海外“学术研究的出版园地”（周清海，2016a，页16）等积极而务实的行动方案。由此可见，既尊重现实又顺应趋势的融濡论是一种积极务实的方法论。

总而言之，与上表中的11种方法论相比，融濡论具有先进性、稳妥性和务实性等三大理论优势。这三大理论优势必将给融濡论提供强大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也必将为融濡论参与解决当代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创造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

七、结论

通过以上对融濡论的阐释、比较与分析，本研究可以作出以下几

点结论：(1) 融濡论是建立在进步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关于多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且不同于文中 11 种主要的传统方法论；(2) 融濡论拥有融论、濡论和差异性和谐⁵为要素内容的“三维⁶一体”的结构组合，具有鲜明的以渐进与和谐为特色的理论个性；(3) 融濡论兼具先进性、稳妥性和务实性三大理论优势，是拥有巨大实践潜力和广阔社会发展空间的方法论。

根据以上研究及其结论可知，本研究基本回答了周清海先生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问题的方法论是什么、主要内容有哪些、内在结构是什么、理论个性是什么和理论优势有哪些等具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对周清海教育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理论建构。同时，本研究认为，由于“认识到文化差异可能有助于避免人们之间的误解” (Darginavičienė, 2018, p.171)，作为一种先进而务实的教育哲学方法论，周清海先生的融濡论对于消除全球化过程中因语言与文化差异性而引发的各种误解而言就非常值得提倡、应用和推广。在当今这样一个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作为一个人类多元语言与文化融合的重点“实验室”，新加坡及其“新加坡经验”将为人类的一体化或共同体创建提供语言与文化方面的宝贵智慧，也为人类减少来自语言与文化方面的冲突甚至战争提供可行的治理方案，并因此具有超历史性的深远意义。而作为“新加坡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周先生的融濡论方法论也必将给整个世界带来智慧的启迪。同时，作为新加坡华文学界的杰出代表，周清海先生恰似赫拉克勒斯 (Ηρακλής) 勇敢地在语言与文化差异性领域将“未来之墙”刺穿了一个孔洞，人们透过这个孔洞隐约能够看到人类未来的语言与文化生活图景。这也许就是周清海先生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带给我们当代人的巨大惊喜及其数十年来华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深刻意义。

5 作为一种要素存在，差异性和谐不同于融论和濡论的主体性存在，而是以一种关系存在着的要素。

6 “三维”：即融论代表着战略性维度，濡论代表着战术性维度，差异性和谐代表着方向性维度。

参考文献

- 陈独秀 (1917) 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
- 费孝通 (2000) 文化自觉 和而不同——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民俗研究》,3,13。
- 姜义华 (2001)《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卷》,北京:中华书局。
- 《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 (1992)《中庸》,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 李光耀 (2011)《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新加坡:联合早报。
- 李光耀 (2013)《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南京:译林出版社。
-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2005)《古代社会》,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萨义德 (1999)《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汤林森 (1999)《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吴大伟 (2012)《〈说文解字〉学说、字源、文化》,奥洛莫茨市:帕拉茨基大学出版社。
- 吴俊刚 (2017)《新加坡又让谁给欺负了?》,新加坡:联合早报。
- 雅克·德里达 (1999)《论文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张之洞 (1898)《劝学篇》,武汉:两湖书院。
- 周清海 (1996) 新加坡的语言教育与语言规划,《中国语文》,2,128。
- 周清海 (2007) 论全球化环境下华语的规范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4,91-95。
- 周清海 (2014a) 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语文教学里的文化问题,《华文教学与研究》,1,49。
- 周清海 (2014b) 华语教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5,1。
- 周清海 (2016a) “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汉语学报》,1,13-16。
- 周清海 (2016b) 迎接汉语大融合的时代,《世界华文教学》,0,5-6。
- 周清海 (2017a) “大华语”与语言研究,《汉语学报》,2,61-62。
- 周清海 (2017b) 语言认同和民族的边缘化,《语言战略研究》,2,1。
- 周清海 (2018a)《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回顾与前瞻》,新加坡:联合早报。
- 周清海 (2018b)《新加坡的华语与华人》,取自:http://www.sohu.com/a/280588756_228930
- Darginavičienė, Irena (2018)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on the Identity of a Person. *Logos*. 37, 164-176. doi.org/10.24101/logos.2018.37
- Saddiqa, Ayesha, Garcia, Maria Isabel Maldonado, & Ali, Nadir (2019) Proliferation of Multi-Cultures Through Globalization: Is It Promoting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r Global Cultur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 75-88. doi:10.5539/ijel.v9n2p75
- Schwartz, Saul (2018) The Predicament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dvocacy, Anthropology, and Dormant Language Communities.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3, 332-355, doi. 10.1111/jola.12204

The Methodology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 Relook At Chew Cheng Ha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DONG, Weiwu, TAN, Chee Lay
Abstract

Multilingualism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exist objectively, and the resulting proble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oo, exist objectively. In order to solve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various civilizations in human history have, for a long time, made unremitting explorations, and formed diverse methodological landscapes. Among them, the immersion theory created by professor Chew Cheng Hai (Zhou Qinghai) represents the contemporary “Singapore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multilingu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evel of the methodology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he basis of Progressivist philosophy, the theory of immersion includes the fundamental gist of melting, immersion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harmony. It has a distinct theoretic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zed by gradualness and harmony, and shows thre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of advancement, stability and pragmatism. It is a methodology with massive practical potential and broad spa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t will certainly be provided that human beings needs viable solutions of reducing conflicts and even wars originated from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therefore have a far-reaching and super-historic significance.

Keywords: language and cultu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methodology, harmon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harmony

DONG, Weiwu, Guangxi University, China.

TAN, Chee Lay,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